

满怀信心走向“不惑”

尹成友

中国金融出版社伴随着我国经济金融事业的发展，走过了一段不寻常的建社、停社、复社，发展的坎坷历程，如今已度过了35个春秋，正走向自己的“不惑”之年。

35年来，特别是自1981年复社10年来，我社机构日趋健全，职工队伍不断壮大，出版规模不断扩展，目前已拥有一支经验较丰富的编辑、记者、出版、发行和管理人员队伍，出版各类金融图书490余种，总发行量达1450余万册。同时，先于出版社诞生的《中国金融》月刊，创刊已有40年历史，在国内享有较高声誉，目前每期发行量达13万余册。作为中国人民银行直属的金融专业出版社，集金融书刊为一体，已成为我国金融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以不可或缺的金融科学知识门类自立于我国出版界之林。

35年风风雨雨，出版社组织机构和人员不断更迭变换，但在长期的书刊出版实践中形成的自己特有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却代代相传，并为本社员工所公认：

一、坚持党性原则，以“服从、服务”为己任。在人民银行总行党组的正确领导下，长期以来，出版社以其鲜明的党性原则坚决服从党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坚定不移地贯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经济金融的发展服务、为广

大读者服务的宗旨，胜利地完成了不同时期的宣传出版任务。几十年来，我社的出版方针从没有偏离过社会主义的方向，出版的书刊在政治方向、政治原则上从没有出现过偏差，起到了党的宣传工具作用。

二、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的原则。多年来，出版社在经营思想和经营方向上，不片面追逐利润，自觉抵制“一切向钱看”的唯利是图的歪风，立足金融专业，多出好书，坚决不出格调低下的坏书。我社出版的书刊在社会上以严肃、健康著称，享有良好的声誉。近年来，我社先后有 18 种图书获得国家级、部委级优秀图书（教材）奖。

三、砥砺良好的编辑作风。出版社的编辑作风集中表现为：对读者、对社会高度负责的思想，严谨不怠的治学态度，无私奉献的革命情怀和孜孜以求的拼搏精神。几十年来，这一良好的作风影响并造就了一支有较高思想水平和业务素质的专业出版队伍。

在我们郑重纪念出版社建社 35 周年的时候，回顾历史，肯定成绩，总结经验，反思教训，为的是发扬过去的好传统、好作风，激励自己满怀信心地面向当前，面向未来。

在今后的实践中，我们将努力探索如何不断繁荣出版事业这一永恒的主题，围绕出好书、多出书、快出书、办好刊物这一中心，重点抓好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

一、强化“参与”意识，增强使命感。金融出版事业是“党的整个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在我国四化建设的历史进程进入本世纪最后十年的关键时期，金融出版工作要继续担负起宣传马列主义，传播金融知识，交流金融业务技术，教育广大干部职工的作用，继续忠诚地宣传党在这个历史时期的经济金融政策，宣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在政治思想上和党保持高度的一致，用正确的舆论牢固地守住金融宣传阵地。与此同时，在这关系着社

会主义兴衰成败，关系着我们民族前途命运的重要历史时期，我们金融出版工作者要增强“参与”意识，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通过自己出版的优秀书刊参与国家大事，参与经济金融决策，影响金融理论探讨和金融实践的趋向，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服务作用。这应是我们这一代金融出版工作者的历史使命。

二、强化改革意识，勇于开拓。我们将以不断开拓创新的精神，通过改革出版社的管理体制，使之增强整体活力和自我发展的机制。一是探索责权统一的社长负责制，把确认社长的责权同加强班子的集体领导，发挥干部职工当家作主的精神和层层负责的制度结合起来；把确立社长、总编的领导地位和强化民主意识结合起来，建立一个统一的，强有力的，高效率的指挥系统。二是推行目标管理责任制，完善由各种岗位目标构成的目标管理体系，以社会效益为中心进行定性、定量的考核，并与奖励挂钩，使出版社的行政管理、业务管理体制日臻完善。三是改革财务体制，由目前的“收支两条线，差额补贴”逐渐过渡到独立经营，自收自支的企业化管理，由单纯的生产型出版社向生产经营型出版社转变。

三、强化竞争意识，全面提高书刊整体质量。我社虽是唯一的金融专业出版社，但并不是独家经营，在目前书刊市场仍不甚景气的情况下，读者大多“货比三家，择优而购”。为此，一要从书刊组稿、编辑、排版、校对到印制、装帧、发行乃至价格等各个方面同其他出版社的金融书刊全面竞争，提高书刊整体质量。二要把出版社的工作重点集中在多出好书上，加强调查研究，制订一个出版社中长期发展规划和图书选题计划，努力开拓一批好的图书选题，实现一批图书重点骨干工程和拳头产品，上马一批同国外合作的新书刊，建立一个多门类、多层次、多系列的图书总体框架。目前，要集中优势兵力，尽快抓出一批具有我社特色的好书，提高图书市场的竞争能力。

四、强化发行意识，实现“双效”。出版要繁荣，不可不重视发行。书刊不能实现最后的发行，前期生产过程中所追求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要落空。目前我社图书发行渠道不畅已经给出版社的工作带来全面影响，因此，要把发行工作作为全社的一个关键问题来抓，在图书的各个生产环节都强化发行意识，整顿发行秩序，疏通发行渠道，减少库存积压，从根本上解决读者买书难，出版社卖书难的问题。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我们要建设一个好的班子。这个班子要紧紧依靠总行党组的领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贯彻国家出版方针、政策，团结协作，指挥自如；我们要建设一支好队伍，这支队伍守纪律、讲文明、政治文化素质较高，热爱金融出版事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兢兢业业地工作，特别能战斗；我们要建立健全一套适合出版社的规章制度；我们还要走出去，请进来，不断地从社会、从兄弟出版社吸取好经验，开阔视野，取长补短。通过8至10年努力，出版社在书刊市场的覆盖率，图书结构的科学性，书刊的总体质量及出版社管理水平，人才结构，资金实力等诸方面力争攀登到一个新的台阶，使中国金融出版社这棵大树，在中国出版界之林中更加茂盛挺拔。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我们深信，只要我们把繁荣金融出版事业始终作为我们追求的目标，我们的工作一定会有新的起色。

让我们满怀信心，走向“不惑”！

1991年4月6日

金融书刊出版四十年

许树信

今年是《中国金融》杂志创刊40周年和中国金融出版社建社35周年。三、四十年来，刊物和出版社经受了风风雨雨的磨炼，走过了曲折艰辛的历程。回顾过去，对比今天，令人由衷地感到当今我国社会主义金融出版事业何等昌盛繁荣！

《中国金融》杂志，是解放初全国财经统一、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创刊的。当时，中国人民银行肩负着制止通货膨胀，发展生产，促进经济恢复的重任，《中国金融》作为人民银行的机关刊物，大力开展了经济、金融方针政策的宣传以及新中国的银行工作经验传播工作。在执行宣传任务的同时，刊物也得到了发展。《中国金融》创刊时是月刊，由于宣传任务加重，读者群日益扩大，发行量迅速增加，到1952年下半年就扩大为半月刊。后来鉴于工作形势发展需要和广大读者的要求，金融宣传工作仅靠刊物一种形式就不够了，于是1956年又创建了金融出版社，在出刊物的同时又编印出版金融专业图书。1958—1959年，《中国金融》又由半月刊改为周报，更名为《中国金融》周报。1960年我国国民经济出现暂时困难，周报和图书相继停止出版。1963年第2季度起，《中国金融》又以月刊的面貌复刊。为时不久，1964年初再改为半月刊。1966年第四季度文化大革命开始，半月刊再次停刊。这次停刊竟达12年之久，直到1979年初才作为

月刊复刊。1981年7月，停办了20年的中国金融出版社恢复了建制，继续出版金融专业图书。1982年，《中国金融》杂志第三次改为半月刊。但只历时一年，1983年年初再恢复为月刊，直到现在。40年来，《中国金融》杂志和中国金融出版社，虽然几起几落，历尽曲折，但我们看到，只要刊物和出版社在祖国大地上存在一天，它就始终不渝地作为我国国家银行的权威刊物和出版机关，发挥着应有的作用。

回顾40年春秋，作为全国唯一的金融专业出版社和总行机关刊物，我们始终坚持了为社会主义服务、为经济建设和改革服务，为金融工作服务，为广大金融职工及社会公众服务的方针，胜利完成了不同历史时期的宣传任务。

《中国金融》杂志，40年来共出版大约371期，近10年来刊物发行总量约达1323.6万册。刊物配合党和国家在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和对银行工作的要求，坚持了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力求深入透彻地宣传阐释经济、金融方针政策，及时报道重大金融活动，组织各地银行工作经验的交流，刊登金融职工政治思想和业务技术教育的教材及讲座，组织对某些重要理论问题、政策问题的探讨和对银行实际工作中某些“热点”、“难点”、“疑点”问题的笔谈和讨论，较生动地反映了金融职工“8小时”内外精神文明生活面貌，较好地完成了总行赋予的任务。多年来，刊物大力提倡理论联系实际学风，既不断加强刊物的政策指导性、思想性、学术理论性，也十分注意稿件的群众性、知识普及性。基本做到每期都有社论、评论，定期准确地刊登授权发布的中国金融统计资料，刊物开辟了《金融政策》、《金融体制改革》、《资金管理纵横》、《资金营运与融通》、《地方党政论金融》、《企业天地》、《学习与借鉴》、《银苑》等多种栏目，使刊物的宣传面不断拓宽，内容日益丰富多彩，宣传的效果不断提高。目前，《中国金融》刊载的文章、材料，愈来愈受到国内外读者

的重视，不少文章不仅在国内重要报刊（如《新华文摘》等）上转载、引用，而且国外有的报刊也转载本刊发表的文章以飨读者。

35年来，中国金融出版社一直是我国唯一的金融专业出版社。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出版部门都很重视金融书刊出版工作。去年全国整顿出版社时，新闻出版署和中国人民银行正式核准中国金融出版社登记注册，确认中国金融出版社为全国金融专业出版社。国务委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李贵鲜在去年的全国银行分行行长会议上郑重表示：“要继续办好金融出版社”。

金融出版社早在50年代就出版了一批新中国早期金融专业图书和教材。如：曾凌、韩雷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货币流通》、中国人民银行专家工作室编的《列宁论货币银行与信用》，以及一些宣传银行工作方针政策，普及银行业务知识等书籍，对于解放初期提高银行职工政治思想水平和业务技术素质，推动社会主义金融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1981年中国金融出版社恢复建制以后，金融图书出版工作呈现空前繁荣景象。1981年，当年仅出版图书1种，发行3.5万册。到1986年，当年即已能出版新书43种，发行114万册。1990年，则当年出版新书108种，比1986年的出版能力提高1.5倍，平均每3天多出版一种新书，当年发行量达到151万册，比1986年增长32.5%。总计10年来本社共出版各类图书492种，发行总量1451万册，相当于全国200万金融职工人均7册以上。

我社10年来出版经济、金融科学学术理论专著、译著方面的成绩是显著的，在金融界、经济界、学术界享有一定声誉。如黄达著的《财政信贷综合平衡导论》、周骏著的《马克思的货币金融理论与四化建设》、陈家盛著的《国际金融通论》、董寿昆著的《住宅经济比较研究》、冯大麟著的《中国经济发展与金融改

革战略》、刘鸿儒编著的《金融调控论》、曾康霖著的《资金论》、喻瑞祥著的《当代中国金融问题研究》、林继肯著的《稳定通货论》、郑先炳著的《货币供求均衡论》、石珉、羊子林著的《外汇银行会计原理》、陈全庚、吴念鲁著的《人民币汇率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重点研究课题《中国保险业的发展》等理论著作，都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和好评。本社特聘钱荣堃教授主编的《国外金融论著译丛》12种，对当今世界上主要金融理论名著作了翻译介绍，受到理论界的高度评价。

为了配合我国金融事业的发展及金融改革不断深化的需要，我社出版了大量金融实务图书。包括金融业务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的介绍、金融业务技术操作方法和经验、外国的和我国历史上的银行业务工作介绍、银行精神文明建设读物，以及银行工作者案头必备的业务手册、专业词书、工具书、资料书等。还出版了一批面向企事业单位、面向社会公众普及金融知识、帮助单位和群众更好地和金融机构打交道的出版物。有些实务图书是以系列丛书形式编辑出版的，如《金融实务与技术丛书》、《金融新业务丛书》等，这几套丛书日前尚未出齐。我社还出版了各种彩色图册，如《人民币图册》、《中国古钞图辑》、《中国东北地区货币》、《储蓄保险漫画》、《现代广告艺术》等。这些图册具有多方面专用价值。不仅行销国内，而且有的在国外也深受欢迎。

金融专业教材的出版，约占每年新书的1/4到1/3。其中既有中专教材、大学本科、专科专业教材，也有大学普通课教材，成人教育教材，如电大、函大教材，银行岗位培训教材等，基本适应了金融系统内外金融专业课程教学的需要。出版的一些优秀教材，如周升业等编著的《中国社会主义金融理论》、《社会主义货币银行学》、盛慕杰等著的《中央银行学》，潘履孚等著的《保险管理学》、孙兆康等翻译的《外国农业金融》，方磊编著的《领导职责与素养》等，为各学校或部门单位长期选用不衰。

我社还与某些国际金融机构建立了出版合作关系。如，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合作出版的《世界经济展望》，每年两期，刊载了世界上百余国家或地区经济、金融数据统计，各国经济、货币政策的特点、变化及分析，世界经济金融形势的分析研究和预测，受到我国经济界、金融界人士广泛关注和欢迎。与亚洲开发银行合作出版的《亚洲开发银行》等书，也受到读者好评。

从1986年以来，我社出版的图书获得国家级和部级评选优秀著作奖的有18种，其中主要的有：《财政信贷综合平衡导论》（黄达著，获1986年孙冶方经济科学著作奖）、《住宅经济比较研究》（董寿昆著，获第三届全国优秀图书奖）、《马克思的货币金融理论与四化建设》（周骏著，获第四届中国图书奖二等奖、第二次全国高等院校金融类优秀教材一等奖）、《保险管理学》（潘履孚等著，获第二次全国高等院校金融类优秀教材一等奖）、《中国社会主义金融理论》（周升业等编著）、《中央银行学》（盛慕杰主编）、《外国农业金融》（孙兆康等编写）以上三部著作均获全国高等院校金融类优秀教材二等奖、《银行经营管理学》（熊范五著）、《人身保险》（乌通元等编写），以上二部著作均获第二次全国高等院校金融类优秀教材三等奖。

回顾金融书刊出版40年所走过的道路，我们要特别珍重和感谢中国人民银行的领导和刊、社老一辈编辑出版工作者的辛勤劳动。《中国金融》杂志是在中国人民银行第一任行长、德高望重的南汉宸同志亲切关怀下创办的。在人民银行党组领导下，先后主管过我们工作的总行领导有：胡景翼、尚明、丁冬放、陈希愈、韩雷、刘鸿儒、朱田顺、童赠银、周正庆、白文庆、郭振乾、王成铭。我们的杂志和出版社正是在他们的有力领导和关怀下，才得以发展并取得成绩的。先后在杂志独立时期和在出版社担任过主要领导工作的老编辑、老出版有杨培新、舒灏、邵平、卢汉川、张厚福、谭秉文、蒿日升、朱川、冯春林、吴公浦、李

福钟、张天祥、余培翹、秦池江等人。在刊、社工作过的同志，按记忆所及，约有170余人。他们呕心沥血、日夜奋战，为出好书刊而尽了最大的努力，奉献出了自己的年华。几十年来，送到读者手中几千万册书刊，就是他们心血的结晶。多少金融职工由于在《中国金融》上发表文章或出版著作而闻名于世或取得某种业务技术职称，而为别人作嫁衣的老编辑、老出版们却至今默默无闻，他们是金融出版界当之无愧的无名英雄，我们要继承并发扬这种忘我无私的崇高精神。

展望未来，今后十年金融工作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从而金融书刊出版也将面临更加繁重的任务。我们将在中央要求出版工作“一手抓整顿、一手抓繁荣”的精神指导下，以提高书刊质量，多出好书好刊为中心，优化选题，调整结构，丰富内容，突出重点，适当控制新书品种，努力扩大书刊宣传形式，尽一切可能适应各级金融机构、广大金融职工和社会各界对金融书刊多层次、多方面的需要。

1991年3月31日

推动金融体制改革 发展中国金融事业

——纪念中国金融出版社建社 35 周年

刘鸿儒

我作为中国金融战线上的一名战士，对《中国金融》杂志和金融出版社有着深厚的感情。到银行工作之前，通过杂志和出版的书，我学习金融理论和业务知识。到银行工作以后，我不仅是出版社一名忠实的读者，而且成为一名热心的作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从做办公厅工作到担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又成了杂志和出版社的积极支持者和领导者。我认为，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金融》和出版社为推动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发展金融事业，作了大量的宣传和理论知识的教育工作。

记得，1978 年底，中国人民银行召开全国分行行长会议，清除“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拨乱反正，银行从财政部门独立出来，恢复银行体系，恢复基本规章制度，同时也提出了银行如何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等重大问题。在那次会议上，与会的分行行长和总行的同志，一致要求组织力量，总结 30 年来银行工作的经验教训，写文章，出书，教育银行工作人员，加

强对社会宣传，防止重蹈覆辙。这次会议之后，《中国金融》发表了不少好文章，出版社也陆续出了一批好书，起了积极推动作用。我当时受出版社的委托，在总行领导和同志们的帮助下，编写了《社会主义货币与银行问题》一书。主要是自己学习，也是配合宣传，作些推动工作。

1979年以后，改革开放的形势发展迅猛，经济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金融领域的变化尤为突出。当时大家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改革，改革的理论根据是什么？商品经济发展了，30多年按照产品经济形成的理论，教科书不适应了怎么办？金融干部以及教师队伍亟需知识更新而又没有书看怎么办？总之，从银行到社会，从金融机构到学校，都渴望读到有关宣传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和金融改革的书及文章。

改革的洪流势不可挡，但配合改革的图书一时出不来。在这种情况下，金融出版社一方面组织人力写书，出书，一方面通过杂志发表文章，介绍外国经验、讨论中国改革方向、措施，并及时地交流各地区改革的具体做法。这样，书刊结合，发挥了优势。

广大金融工作者，一面学习，一面实践。许多有实践经验的同志，同理论工作者相配合，写文章、编书，两方面结合，取得了理论联系实际又指导实践的丰硕成果。这是十年来金融改革顺利发展和金融理论得到丰富、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近10多年来，金融出版社出版图书不仅数量多，而且种类多、内容丰富、质量较高。《中国金融》发表的通讯、经验、理论文章，不论从广度上看还是从深度上看，都是历史上空前的。它既反映了金融改革和金融事业发展的变化，也反映了理论研究所取得的重要成果。我们出版的书刊，对于传达中央的方针政策、交流经验、理论研究，对于统一改革的思想认识，推动改革步步深入，对于培养干部、改善干部的知识结构，提高干部的马

列主义理论水平，都起了积极的、意义深远的作用。

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肯定了“八五”期间以及90年代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明确了深化改革的方向、任务和重大政策措施。国务院有关部门正在研究落实具体方案和措施。在实现第二步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伟大进军中，金融业担负着繁重而又艰巨的任务。金融出版社和《中国金融》，要发扬40年来，特别是近10年来的优良传统，总结已取得的成功经验，认真研究新形势，办好刊物，出好书。要坚定方向，适应变化，主动组稿，广泛宣传，发挥优势，敢于竞争，在金融理论宣传阵地上不断攀登高峰。

庆祝中国金融出版社建社35周年!

庆祝《中国金融》创刊40周年!

1991年2月19日

风雨四十年 相知结情缘

周正庆

今年是《中国金融》创刊40周年，说来也巧，我在人民银行工作也正好40年。40年的风风雨雨，我与《中国金融》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51年初，我进入银行工作。尽管有搞好本职工作的热情，但金融知识非常浅薄，工作起来力不从心。当时，我在基层工作，很少听到总行金融方针、政策的传达，很难了解同行们在业务操作上的好的做法经验。那时，金融书籍又很少，为了及时了解金融方针政策以及上级对各项金融工作的布署，学习一些金融知识，提高工作能力和水平，《中国金融》就成了我的良师益友。每当借到一本新的《中国金融》，我几乎要看完所有的文章，对一些重点的文章，我常常要摘录下来。久而久之，我从《中国金融》上了解了不少信息，学到了很多有益的知识。

1953年，我调到人民银行北京市分行从事业务综合工作，并兼管分行的宣传报道，成为《中国金融》的通讯员。从那以后，我不仅是《中国金融》的读者，而且是该刊物稿件的组织者和作者。我坚持每月至少投一篇稿，同时还组织通讯组的其他同志投稿。开始，稿件的采用率不高，但我始终坚持不懈。我觉得

稿件采用了固然可喜，但即使没有采用，也可以起到反映情况、传递信息的作用，这同样是通讯员的义务。同时，通过写作，能有助于对金融工作更深的了解，写作能力也不断提高了。现在想起来，当时作为《中国金融》的通讯员，对于我熟悉和了解金融业务和理论知识，提高文字写作能力，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为以后的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当时，我与《中国金融》编辑部联系最多的是李福钟同志，我们时常在一起讨论宣传报道中的问题，他对我搞好宣传报道工作给了很多支持和帮助。

1959年11月，我参加了总行召开的全国银行宣传工作会议。会议交流了各省、市金融宣传工作的经验，听取了总行领导丁冬放行长助理关于做好金融宣传工作的报告。当时，总行正召开金融先进单位、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中国金融》编辑部组织我们与与会者现场采访这次会议，并在宣传报道的方式方法上进行了有益的指导。通过这次现场练兵，对提高我们宣传报道能力有很大的帮助。在以后的几年里，我组织的稿件更多了，写作更勤了，投稿的刊用率也提高了，与《中国金融》的联系也就更多了。这种既是读者又是作者的关系，一直坚持到1966年。

“文革”期间，《中国金融》暂时停刊了，我也下放农村劳动了将近5年。到1978年，《中国金融》复刊时，我又成为复刊第一期稿件的组织者和作者。以后不管是在分行工作，还是在基层办事处工作，我都肩负着通讯报道的职责。80年代初，我担任人民银行北京市分行的领导工作，仍然是《中国金融》的特约通讯员。

1986年，我调到总行担任领导工作。无巧不成书，由于工作需要，我负责主管金融出版社的工作。当时，冯春林同志是社长，余培翹同志是副社长，吴公浦同志任总编辑，李福钟、张天祥同志是副总编辑。我们在工作上合作得很愉快。到总行工作以来，我仍抽时间翻阅《中国金融》，并坚持为《中国金融》写

作，对一些重要的金融方针、政策和一些重要问题及时做了宣传和说明。

40年来，《中国金融》以它的权威性、鲜明性、广泛性、准确性，逐步扩大了影响，成为金融系统颇具影响力的老刊物，无论在质量上还是在数量上都有了飞速的发展。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来，在总行党组的领导下，经过编辑人员、通讯人员、广大金融干部的努力，刊物坚持了正确的宣传方向，积极宣传了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措施以及业务做法，宣传了基层工作情况和经验，宣传了精神文明建设，从形式到内容，版面的设计、图片的编排等方面都有所创新和改进，对上情下达，下情上达，推动金融工作，搞好金融队伍建设，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今天，《中国金融》已进入不惑之年，恰逢实行“八五”经济计划的第一年，这是一个好的机遇，也面临新的挑战。“八五”期间，我们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二步的战略目标，要继续执行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而且使之更加完善，更有成效。要建立更加扎实的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保持经济发展的后劲。这不仅对金融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对金融的宣传报道工作提出了更高的标准。我希望《中国金融》在鲜明性、准确性、生动性上再下一番功夫，成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金融实践相结合的金融舆论阵地；成为启迪思想、陶冶情操、提高广大金融干部的政治思想、理论政策、业务技术水平的思想库；成为群众喜闻乐见的良师益友；成为上情下达，下情上达，传播金融信息，普及金融知识、沟通思想的园地。

愿《中国金融》越办越好！

我的祝贺

尚 明

《中国金融》创刊以来，经过了不平凡的40年，为宣传金融政策，提高干部业务水平，促进金融管理方面，都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因而，它在读者中享有很好的信誉，成为与读者交流思想、交流心得的园地。这也是历届编辑部的同志们长期不懈努力，贯彻编辑方针的结果。

当《中国金融》创刊之初，正值我国经济处在恢复时期，金融工作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其中之一是，如何使广大金融干部掌握现代金融工具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服务。回顾40年来，尽管在具体工作上还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从总体上看，《中国金融》是严格遵循创刊宗旨，根据实际情况不断发展前进的。

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指引下，对未来十年，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预期将会取得更大的成绩！当我们祝贺《中国金融》到“知命”年的时刻，呈现更加辉煌的面貌。

稍后成立的金融出版社，也有35年的光荣历史，坚持专业，多出好书是其特点，这是值得庆贺的。精神产品，能否坚持健康、优质，就某种意义而言，是关系到民族兴衰和子孙万代的大事。相信未来的日子里，出版社会把这大事办得更好。

1991年2月

—17—